

文化管理学导论

刘吉发 金栋昌 陈怀平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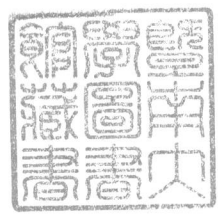
WENHUA GUANLIXUE DAOLUN

G0
20138

文化管理学导论

刘吉发 金栋昌 陈怀平 著

WENHUA GUANLIXUE DAOLUN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管理学导论/刘吉发, 金栋昌, 陈怀平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7-300-17093-0

I. ①文 II. ①刘…②金…③陈… III. ①文化管理-管理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7271 号

文化管理学导论

刘吉发 金栋昌 陈怀平 著

| | | | |
|------|---|------|---------------------|
| 出版发行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邮政编码 | 100080 |
| 社 址 |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 | |
| 电 话 | 010-62511242 (总编室) | | 010-62511398 (质管部) |
| | 010-82501766 (邮购部) | | 010-62514148 (门市部) |
| |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 |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
| 网 址 | http://www.crup.com.cn | | |
| |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 |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
| 印 刷 |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 版 次 |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
| 规 格 | 185 mm×260 mm 16 开本 | 印 次 |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 张 | 23.75 插页 1 | 定 价 | 46.00 元 |
| 字 数 | 512 000 |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本书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西部地区政府主导型文化管理模式建构研究”（10YJA630098）的阶段性成果、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长安文化产业研究中心重点资助项目

前 言

21 世纪是文化繁荣发展的世纪，也是文化间交流、碰撞、融合的世纪。在全球化、数字化、网络化趋势的渗透影响下，文化越来越趋于多元，也越来越成为彰显民族特色、凝聚国家力量的重要载体。有关文化的任何维度的内容，因此获得了鲜活的生命力——文化的内容被不断挖掘、整合，文化的载体被不断创新、延展，文化的态势被不断刷新、推进……文化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扩张期、繁荣期、竞争期。放眼国际，任何民族、国家或地区，都不吝为文化开创一个欣欣向荣的局面。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文化已然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在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主流发展中国家，以及众多其他后发国家，也都纷纷实施“文化立国”、“文化强国”战略。文化正如旭日朝阳，在磅礴之势中跃然前行。

这一现实背景在催生新的文化态势的同时，也催生了新一轮对于文化及其关联事物的关注。因而，一如文化事务本身，与文化关联的事物也因其价值而重要性日增。值得注意的是，在与文化关联的事物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事物——它关心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配置文化发展的要素事物、关注文化发展的环境体制，更善于从效率效能视角分析和指导文化及其关联事物的发展，这便是文化管理工作。所谓文化管理工作，实质上是以文化为管理对象的工作，是伴随文化左右的“管家”和“保姆”，是推动文化经由自发转向自为、自觉、自信的基石。这凸显了文化管理工作在增进文化发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以及在现实层面推动其与文化发展战略的契合性的价值功用。

发展繁荣文化及其关联事项，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与职责。正是基于这种“兴文化之名实”的使命与强化“文化管理之价值功用”的职责，我们试图对文化的“管家”与“保姆”——文化管理工作做合时宜、合事理的梳理，形成《文化管理学导论》一书，以总结近年来我们在这一领域的所感、所思、所为。

在本书的逻辑布局方面，我们试图从文化管理要素入手，在宏观、中观、微观视角的关照下，以及对中国实践的现实关照下，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形成了“四个层次十二章”的布局框架，具体的章节顺序为：第一个层次是宏观理论层次，集中在本书的第一章至第四章，重点阐述文化管理学科属性、文化管理主体、文化管理客体、文化管理模式等内容；第二个层次是中观实践层次，集中在本书的第五章至第七章，重点阐述政府、文化企业、文化社会力量的文化管理内容；第三个层次是微观实践层次，集中在本书的第八章至第十章，重点阐述文化产业集群、文化项目、文化要素的管理内容；第四个层次是对中国实践的关注层次，集中在本书的第十一章至第十二章，重点阐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体制改革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实践。

著作充分凝聚了团队的知识力量，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行文过程中，我们出于各自研究领域及专长的考虑，也进行了必要的分工，刘吉发教授承担了本书框架结构的设定与第一章的撰写工作，金栋昌博士承担了第二章至第八章的撰写以及统稿工作，陈怀平副教授承担了第九章至第十二章的撰写工作。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也吸收了学界、政府部门等领域的丰富研究成果，在书中我们都予以标识，以表达尊重、感谢之情。当然，著作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错漏、不规范之处，恳请读者、学界同人批评指正。

著者

于长安大学

2013年1月26日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绪论 | 1 |
| | 第一节 文化“何以”能管理 | 1 |
| | 第二节 文化管理的基本价值 | 15 |
| | 第三节 文化管理学的学科属性 | 27 |
| 第二章 | 文化管理主体 | 39 |
| | 第一节 文化管理主体的内涵属性 | 39 |
| | 第二节 文化管理主体的关系架构 | 48 |
| | 第三节 我国文化管理主体的嬗变 | 57 |
| 第三章 | 文化管理客体 | 65 |
| | 第一节 文化管理客体的内涵界定 | 65 |
| | 第二节 文化管理客体的逻辑结构 | 70 |
| | 第三节 文化管理客体的属性特征 | 83 |
| 第四章 | 文化管理模式 | 91 |
| | 第一节 文化管理的基本手段 | 91 |
| | 第二节 文化管理模式的属性 | 96 |
| | 第三节 文化管理的主流模式 | 107 |
| 第五章 | 政府文化管理 | 114 |
| | 第一节 政府文化管理的职能定位 | 114 |
| | 第二节 政府文化管理的结构层次 | 121 |
| | 第三节 政府文化管理的绩效评定 | 131 |

| | |
|----------------------------|-----|
| 第六章 文化企业管理 | 138 |
| 第一节 文化企业的基本界定 | 138 |
| 第二节 文化企业的管理要点 | 153 |
| 第三节 文化企业的跨界管理 | 164 |
| 第七章 文化社会治理 | 177 |
| 第一节 文化社会力量的发展定位 | 177 |
| 第二节 文化社会治理的基本范式 | 183 |
| 第三节 文化社会治理的综合保障 | 192 |
| 第八章 文化产业集群管理 | 199 |
| 第一节 文化产业集群的典型机制 | 199 |
| 第二节 文化产业集群的管理体系 | 209 |
| 第三节 文化产业集群的协同创新 | 218 |
| 第九章 文化项目管理 | 227 |
| 第一节 文化项目管理的属性特征 | 227 |
| 第二节 文化项目的管理流程 | 237 |
| 第三节 文化项目的管理创新 | 256 |
| 第十章 文化要素管理 | 261 |
| 第一节 文化资金管理 | 261 |
| 第二节 文化人力资源管理 | 271 |
| 第三节 文化市场管理 | 287 |
| 第十一章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299 |
| 第一节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涵属性 | 299 |
| 第二节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供需机制 | 311 |
| 第三节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绩效管理 | 325 |
| 第十二章 文化体制改革 | 340 |
| 第一节 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维度 | 340 |
| 第二节 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 | 347 |
| 第三节 文化体制改革的当下重心 | 357 |
| 参考文献 | 362 |

文化是人类历史的逻辑沉淀，是民族个性的外在彰显。随着人类文明结构的不断软化，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特别是在产业结构软化和经济下游化的今天，文化经济已经成为各国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重要战略选择。文化的重要性决定了文化管理是人类管理活动中的重要层面，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

第一节 文化“何以”能管理

文化代表着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核心和人文内涵，在其外延上是个体和群体间的生活抽象，这种生活的抽象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凸显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理性自觉。因而，文化标榜了人的属性，又在理性自觉层面通过人的作用——管理的介入，实现了人与文化的共生。

一、文化的管理诉求特性

文化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它是社会有序性的集中体现。作为人类活动的典型状态，文化有其内涵规定与属性特征，并在与人的互动共生中表达其管理诉求。

(一) 文化的基本内涵

“文化”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其间有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刘向的《说苑》中也有“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的内容。但这里的“文化”是与“武功”相对的，取文治教化之意，这与现代文化中的概念不能等同。现代所称“文化”(culture)，源于拉丁文“cultural”，原意为“对土地的耕耘和对植物的栽培”。虽然文化一词由来已久，但文化的现代定义却是在19世纪才被赋予的。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首次对“文化”进行了全面而明确的定义，他指出：“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①

继泰勒之后，学术界关于文化的研究日益深入，有关文化的定义也层出不穷。参照美国著名人类学家A. L. 克娄伯和C. 克鲁克洪《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中对西方1871年到1951年间的164种文化定义的梳理，我们可以将目前200余种的文化定义划分为以下5类：(1) 列举、描述性定义。以深受爱德华·泰勒影响的博厄斯(Boas)为代表，他认为“文化包括一个社区中所有社会习惯、个人对其生活之社会习惯之反应及由此而决定的人类活动”^②。(2) 历史性、遗传性定义。该定义侧重在遗传方面，它的中心命题是关心文化的来源、文化存在及继续生存的原因等，并将文化视为“团体中过去行为之积累与传授的结果”。(3) 规范性定义。它强调文化是一种具有特色的生活方式，或是具有动力的规范观念及其影响，O. 林纳勃格就将文化定义为“由社会环境所决定的‘生活方式’之整体”^③。(4) 心理性定义。认为文化是满足欲求、解决问题和调适环境以及人际关系的制度。C. S. 福德认为“文化是由通过学习所得解决问题之道所组成”^④。(5) 结构性定义。这种定义将文化从具体的现象中抽象出来，认为文化不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关系。在这方面最著名的是C. 克鲁克洪和W. H. 凯利德关于文化的定义，指出“一个文化乃历史上源起于为求生存所作的明显或含蓄之设计体系，此体系为此一群体之全部成员，或某部分成员所共有”^⑤。

“文化”有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之分。广义文化是指人们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及在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关系的总和，包括有形的物质资源和创造物，还包含语言、习俗、礼仪、信仰等精神财富及人类关系；狭义文化则仅指人们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主要指以科学、哲学、宗教、教育、艺术、风俗习惯为代表的精神文化和以政治、法律、经济体制与机制为代表的制度文化。本书中我们所讨论的“文化”是一种与文化内容直接关联的文化范畴，它既囊括物质形态的文化，又关涉非物质形态的文

① 转引自[美]马文·哈里斯：《文化、人、自然——普通人类学导引》，136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② 曾小华：《文化·制度与社会变革》，2~3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③ 曾小华：《文化定义现象论述》，载《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3(5)，12页。

④ 索艳琳：《论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载《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3)，91页。

⑤ 李传刚、朱平：《刍议文化的定义与功能》，载《科技信息》，2008(29)，186~187页。

化，是典型的广义文化范畴。

（二）文化的属性特征

文化既标榜人的存在，又与人共生互动。作为人类社会的特定现象，在其本质属性、内涵形态、发展取向上各有规定性，这种规定性被分别界定为人本性、多样性、传递性，从而构成了文化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征属性。

1. 文化的人本性

文化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类劳动的对象化（外化），同时又是自然物和类创造物（如社会关系）的主体化（内化）。文化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外化与内化的动态统一。从本质上来看，文化有典型的人本特征，这主要是指文化的产生、发展以人的产生、发展为核心依据。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在于劳动，人类被证明为存在物的过程是人类进行劳动和改造世界的过程，文化则是人类改造世界的过程和结果的总和。^①可见，文化的产生源于人类的产生，伴随着人类劳动工具的丰富、劳动形态的变化，人类改造世界的程度和广度的不断变化，以人为本质的文化也必然会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

2. 文化的多样性

文化的多样性是指文化本质在多元群体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区别和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内容上的多元性。每一种文化都拥有自己的历史精神和人文传承，都是不同民族“相互尊重、理解、宽容、吸收、融合，以及共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形成”^②。不同的生成背景决定了不同的文化内涵，从而体现出文化在内容上的多样性。二是形式上的多样性。文化是抽象的、隐形的，无法直接被人们感知，它只有依附于显性的载体，借助于具体的手段、方式才能展示出来。由于载体的不同和展示方法的区别，文化也就变得千姿百态。同样的一则爱国故事，你可以画成一幅画、拍成一部电影或是编成一部书，虽然我们最终体会到的都是爱国情怀，但我们接受这个信息的形式却是丰富多彩的。文化的多样性表达了人化的多样性，同时也隐含了多元文化间的平等状态与融合交流的属性。

3. 文化的传递性

文化的传递性指的是文化本身的传承性和文化间的交流性。从纵向上看，由于文化是在长期人类活动中形成的、凝聚着民族精神和历史特色的人文内核，它一旦产生就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基本不会有本质上的变化。这种稳定性是文化自身一脉相承的根源，也是一个民族久兴不衰的精神支撑。从横向上看，由于文化的开放性，不同文化因素会不断交流、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这种文化主体间的沟通和交流促使了不同文化符号和价值观念的不断碰撞、整合、协调，这是文化不断丰富、繁荣的根本动力，也是文化多样性存留的重要原因。

（三）文化的管理诉求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维系民族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社会互动

^① 参见郭齐勇：《文化学概论》，17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

^② 缪家福：《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多样性》，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共生的精神纽带。这既意味着文化与其他范畴统合为社会整体的属性，又规定着文化必须服从社会整体发展规律的基本使命。具体而言，出于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有机统一目的，对文化应有特定的管理，辅助其实现从自发到自为乃至自觉的跨越。

1. 文化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

文化的发展具有阶段性。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相关论述，文化的生产和演进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三个阶段。其中，文明时代是文化发展的最高级阶段，它是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的积累，是文化的价值体系。在文化发展为文明的过程中，由于文化先天的本质差别和后天发展中的不同影响，文化在自发成长中必将会出现良莠不齐、参差不齐的发展现象，先进文化的发展可能受到落后文化的抑制，甚至可能出现短时期内文化的逆势发展。为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我们必须对文化进行管理，促进文化在时代进程中的优胜劣汰，保持自身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先进性。我们不仅要建立先进的科学技术、价值观念和社会意识形态，还要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从而保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文化的发展道路上、在历史的行进过程中持续前行。

2. 文化经济属性的必然之需

文化的经济属性源自文化的经济化。众所周知，当代经济发展的五个基本要素是物质资源、技术资源、人力资源、资金资源和信息资源。伴随着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文化产品的不断丰富，物质性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成为经济发展的第六大资源，即文化资源。由于文化资源具有可重复利用性和虚拟性，文化产品的开发具有无限拓展性，文化产业的门类也五花八门，这种从文化资源到文化产品到文化产业的转化，将最终转化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部门，这便是文化经济化。

当今时代，文化与经济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交相呼应。文化的经济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国家实力的提升；经济的文化化则刺激了文化的沟通交流，带动了文化的发展繁荣。正是这样一个文化与经济交织的过程，需要这样一种机制，即实现文化产品收益的机制，来保证文化与经济的共赢。这种机制在本质上就是相关要素的优化配置与生产、流通、消费等，也即广义的管理。此外，出于整体合法性与合理性考量，也仍然需要对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予以必要的监管，以确保文化经济功能的最优化、最大化，这种监督也是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

3. 文化政治属性的基本规定

文化的政治属性指的是文化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主要表现在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属性和非阶级社会的社会性。文化是人类生活经验的总结，也是当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体现。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价值的出现，阶级社会产生，少数的统治阶级占有多数的生产资源，确立了在经济生产和政治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以统治阶级观念为核心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就

是意识形态，它是统治阶级维护阶级统治、保障政治权力的文化工具。按照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在科技革命的大力推动下，生产力进一步解放，阶级最终走向消亡。这个阶段政治中心由国家权力转向公共权力，文化不再是统治阶级维护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而成为人们围绕公共权力开展政治生活的观念体现和精神支撑。

究其根源，无论社会发展到哪一个阶段，文化与政治始终紧密相连，它在阶级社会表现为意识形态，是维护阶级统治的文化工具，在非阶级社会则成为人们获取公共权力的精神支撑。文化的这种政治属性要求文化的发展不能放任自流，特别是在当今时代，我们必须重视文化凝聚社会共识、巩固民族认同感的价值。而这就规定了必须对文化及其发展进行某种引导与规划，以最大限度地形成合乎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文化状态。这种层面的引导与规划，即是管理的具体表现。

二、文化管理的基本意蕴

如同文化的产生、传播、冲突、变迁是一种社会生活一样，文化管理也是一系列行为的集合。从这一角度来看，文化管理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工作、社会范畴，因而就应该有其明确的内涵与属性规定。

（一）文化管理的内涵界定

目前，学界对于文化管理概念的界定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将文化作为手段的文化管理，这是一种区别于经验管理、科学管理的新型管理方式，是关注于理念、精神的，倡导自律、自觉的，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它实现了人类管理由刚性到柔性、由被动到主动、由外化到内化的转变；二是以文化为对象的管理，这种文化管理以人及其组织形式为主体，以文化为对象，通过对文化范畴与事务的规范指导，我们可以将这种文化管理定义为文化管理主体依据管理学的基本原理和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对文化及其事务实施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协调的行为过程。这也构成了本书关于文化管理内涵的基本认识。

（二）文化管理的属性边界

相对于人类其他的管理活动，文化管理具有鲜明的特征和属性，相对于管理科学中的文化管理，本书中的文化管理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1. 文化管理的基本特征

文化管理是人类管理活动中的重要层面，它与经济管理、政治管理、社会管理共同构成了人类管理活动的整体框架，区别于其他管理，文化管理具有明显的政治性、系统性和交叉性。

（1）文化管理的政治性。从文化管理的来源来看，文化管理作为显性活动产生于经济、政治管理活动以后，是政治管理的附属品。这一逻辑规律可以演绎为：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们为获取经济价值，开始进行经济管理活动；而在阶级产生以后，统治阶级又在维护政治统治、保持组织和社会稳定的目标导向下，建立了国家这一暴力工具，从而对政治进行管理；随后，为进行意识形态宣传，从精神上进行

更为深刻的阶级控制，他们又开始在政治管理的过程中附着对文化实施管理。可见，文化管理从产生之日起就带上了明显的政治烙印。如今，由于重视文化的社会价值及政治价值，文化范畴及其相关事务也被列入执政党、政府部门的职责领域，文化管理的政治属性也更加直接、清晰。

(2) 文化管理的系统性。文化管理是整体的、系统的、有意识的，多主体、多要素介入的工程。从文化管理的结构来看，文化管理涉及了文化管理主体、文化管理客体和文化管理中介。其中，文化管理主体是人及其组织形态，文化管理客体是文化管理主体的作用对象，文化管理中介是文化管理主体的作用手段，三者联系紧密，共同构成了文化管理的框架结构与基本模式。从文化管理的流程来看，文化管理包含了信息收集、预测、决策和控制各个管理阶段，贯穿了文化管理的整个作用链条，表现出文化管理由结构到流程上的系统性。此外，文化管理的系统性还体现在文化管理处于社会管理大系统之中，因为文化管理状况与水平将会影响文化的整体发展实力与未来走向，对于国家而言是一种系统性的影响。

(3) 文化管理的交叉性。文化管理是一项复杂的人类活动，它的交叉性主要表现在管理内容上。从所关涉的学科知识来看，文化管理涵盖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运筹学等在内的多个学科，需要综合运用人类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对文化发展规律进行研究、总结的科学成果，需要借助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教育手段等多种方式交叉进行管理。由此可见，它在内容上的广博性和性质上的复合性决定了文化管理的交叉性。

2. 文化管理的边界问题

我们所论述的文化管理，是区别于管理科学的文化管理。众所周知，管理科学先后经历了经验管理、科学管理和文化管理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文化管理”阶段以1982年美国管理学家迪尔（T. E. Deal）和肯尼迪（A. A. Kennedy）合著的《企业文化公司生活的典礼和仪式》一书中首次提出“文化管理”^①（cultural management）一词为肇始。随后，伴随着企业文化热的兴起，“文化管理”逐渐成为新的管理思想与流派。

在管理科学中，文化管理被视为一种理念、理论和模式，主要是指管理者采用组织文化指导组织成员的行为的方式和过程。文化管理主要有三层内涵：一是“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组织文化管理思潮、管理方式”^②，它是一种以人为本位、以价值观为核心、以文化执行力为驱动的管理思想和理念；二是研究如何建设和运用有特色的文化，并将文化运用于管理的理论体系；三是“通过组织文化来治理组织，组织文化建设成为带动组织管理全面工作的‘牛鼻子’”^③的管理模式。归根结底，管理科学领域的“文化管理”履行了一种“手段式使命”，其目标旨在借助文化这一工具达成组织目标。

① [美] 特伦斯·迪尔、阿伦·肯尼迪：《公司文化》，13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② 刘惠坚：《试论企业文化管理》，载《现代哲学》，2000（1），20~24页。

③ [美] 杰弗瑞·克雷默、杰克·韦尔奇：《领导艺术词典》，158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在研究了管理科学中文化管理的来源、定义和内涵后，我们可以看到，相比较而言，本书所指的文化管理与管理科学所称的文化管理差异迥然。

首先，就其本质层面而言，管理科学中的文化管理是管理思想发展的最新阶段，被视为一种管理理念、管理手段和方式，而本书所指的文化管理则是以文化为具体管理对象的管理工作和管理过程，二者的本质属性存在差异。其次，就与文化的关系而言，前者是以文化为手段的管理，是“用”文化进行管理；后者则是以文化为内容的管理，是“对”文化进行管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二者存在巨大差别，但是二者并不矛盾，因为作为手段的文化管理可以为作为目标的文化管理所用，以提高作为目标的文化管理的效能。因此，二者的区别构成了彼此的边界，二者的联系也构成了彼此的关联机制。

总体来看，管理科学中的文化管理与本书所指的文化管理主要有两点区别：一是与管理的关系不同，前者是管理的一种理念、方式和范本，是管理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后者则是管理的一项具体活动和行为。二是与文化的关系不同，前者是以文化为手段的管理，以“用”文化进行管理；后者则是以文化为内容的管理，是“对”文化进行管理。

三、文化管理的理论实践

文化管理有着深刻的理论背景和实践经验，在了解国内外关于文化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我们因循时间主线，对我国文化管理的历程进行了重要的探讨，从而为系统论述文化管理提供客观依据。

（一）文化管理的理论渊源

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国外文化资源主要通过市场进行配置，关于文化管理的研究也基本集中于文化产业、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等领域。在经济发展和历史背景的影响下，我国在文化发展中的长期研究虽然尚未形成系统的文化管理理论，但也产生了一些颇具价值的思路和结论。

1. 西方文化管理理论

总体而言，西方对于文化管理的相关理论叙述主要包括西方文化产业理论和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

（1）西方文化产业理论。

西方文化产业理论根源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法兰克福学派从批判的角度出发，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文艺创造已成为一种采用科学工具的机械化和自动化作业。这种以大规模的复制和批量生产文艺产品为特征的“文化工业”以市场为主导，以利润最大化为动力，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陷入被动，丧失创造性，最后导致商品的单一化和消费的单一化。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文化工业”是文化的异化，其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衰退的标志。

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带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文化工业”逐渐被中性词汇“文化产业”置换。1980年年初，在欧洲议会所属的文化合作委员会

组织的专门会议上，各类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就“文化产业”的含义进行了深刻探讨，标志着文化产业成为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文化—经济”类型。由此开始，西方关于文化产业的研究向着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个方向发展开来。

文化产业的基础理论始于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化研究”中对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研究。他们重点对文化产品的内容进行了意识形态的讨论和文化产业符号的生产机制及原则的研究，并运用哲学、政治学、文化话语等对其进行了思辨性极强的理论探讨，被后人称为“伯明翰学派”。其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发现，大众对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并不是一个既定意义上的简单接受过程，而是一个意义选择和重构的复杂过程。“这一结论标志着传统的文化批判理论已经不应该继续成为阻碍文化产业发展的障碍。”^①另外，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ric Jameson）、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则“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文化经济’与‘金融经济’的区别进行了解释，从费斯克起，越来越多的文化产业研究者开始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了文化及其产业化的双重属性上”^②。文化产业的应用理论则与各国的文化产业的实践发展和政策制定紧密相关，主要包括文化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和管理以及文化产业的地位恢复等方面。其典型代表是英国著名媒体理论家尼古拉斯·加纳姆（Nicholas Garnham）。他认为“文化产业采用了特有生产方式和行业法人组织来生产和传播符号，这些符号的表现形式……都是文化商品和服务”^③，为重塑文化产业地位作出了突出贡献。查尔斯·兰迪（Charles Randy）则将经济学上的“价值生产链分析法”引入文化产业，提出了“文化产业的五个阶段的过程，包括文化产品的创意、生产、流通、发送机构和最终消费者的接受”^④。

在长期的理论积累和实践探索中，西方文化产业运用理论主要形成了以下观点：（1）文化产业主要是指包括畅销小说、商业电影、音像制品在内的“大众文化”；（2）文化产业是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它的发展需要遵从文化艺术和商品生产的规律；（3）文化产业以营利为目的，以利润最大化为追求；（4）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文化在结构、形态、格局上的重大变化，导致了文化的商品化和消费化，也使传统的文化观念、文化生产方式、接受和消费方式以及文化作用方式发生了重要变革”^⑤。

（2）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

为探讨国民经济财富的来源和增长原因，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 Baptiste Say）、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和俄国经济学家昂利·施托尔希（Henri Storch）在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与财富相关的论述的研究批判下，对精神生产的内涵、特征及其与物质生产的关系进行了

① 叶朗：《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2003）》，14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② 同上书，15页。

③ 同上书，16页。

④ 胡惠林：《文化产业学：现代文化产业理论与政策》，3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⑤ 欧阳友权：《文化产业通论》，11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系统研究，并提出了精神生产是“内在财富的生产”或“财富的原因”，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互为因果、互相作用等命题，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精神生产理论。

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精神生产理论的批判继承下，马克思从唯物主义的高度出发，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剩余价值理论》等一系列著作中对精神生产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重新回答，形成了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

一方面，马克思重新界定了精神生产的内涵，认为精神生产是“关于意识的生产”^①，它同人类的物质生产及个人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一样，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和普遍形式，是“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②的，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③的生产方式。按照精神生产的产品与精神生产者之间关系的区别，马克思将精神生产分为两种形式：“生产的结果是商品，是使用价值，它们具有离开生产者和消费者而独立的形式，因而能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一段时间内存在，并能在这段时间内作为可以出卖的商品而流通，如书、画以及一些脱离艺术家的艺术活动而单独存在的艺术作品。……产品同生产行为不能分离，如一切表演艺术家、演说家、演员、教员、医生、牧师等等的情况。”^④另一方面，马克思就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论述。首先，马克思明确指出物质生产是精神生产的前提和基础，精神生产依照物质生产的基本规律发展变化这一基本事实；其次，他认为由于精神生产的相对独立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在发展中会呈现出一种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二者发展的不同步和二者在一定的社会具体历史条件下具有的对抗性^⑤；最后，马克思认为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会产生积极的反作用，这种能动的反作用主要通过文化产品的生产、生产工具的更新、意识形态教育和先进理论知识传播实现。

2. 我国文化管理理论

在长期的理论研究和探索下，我国理论界在文化管理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初步确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文化管理指导思想，以文化产业、文化事业、民族遗产、文化市场、文化组织、文化政策、文化体制改革、国际文化交流为主体的文化管理内容体系。

目前，我国对文化管理的系统研究有：高永贵《文化管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胡惠林、陈昕、单世联《文化战略与管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方彦富《文化管理引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李锡东《文化产业的营销与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赵晶媛《文化产业与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I，442~4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⑤ 参见景中强：《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4），58~62页。